

流離與抗爭：我的家族如何走過二十世紀的動盪與現代化

科管院學士班 邱宇慈 113070042

一、前言

我的家族史由兩條線編織而成，這兩條原本平行的生命線，因為二十世紀世界局勢的動盪而交織在台灣這片土地上。一條來自我的祖母，身為太魯閣族的她，見證了家族在帝國擴張與政權更迭下生活的轉變，家族經歷了土地變為國有的過程，從此開啟與資本(亞泥)漫長的抗爭。另一條線則來自我的祖父，他來自江蘇省，1949年受國共內戰影響，隻身隨軍隊跨海來台，他從一個本應在家鄉生活的青年，變成在異鄉尋找歸屬的軍人。

本文旨在透過這段家族史，探討外部世界的轉變如何影響我的家族。我將以「土地」和「身份」作為討論的核心，分析日本殖民與戰後的國家體制如何重塑太魯閣族的生存空間，並探究戰爭引發的遷徙如何促成跨族群的結合與身份認同的轉變。為了完整呈現家族歷史的脈絡，我透過訪談我的父親收集口述記憶，並結合相關歷史文獻進行對照。

這份報告不僅是對家族往事的追尋，也是我作為一名當代大學生的自我覺醒。身為這兩段歷史交會の後裔，我該如何透過學習與反思，承接家族尚未結束的土地抗爭，並在這段複雜的過去中找到「獨一無二的我」的定位。

二、流離與落地：戰爭遷徙下的生存策略與婚姻

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遷往台灣，世界局勢在國共內戰的餘燼中劇烈震盪。¹對於當時生活在戰爭格局下的人們而言，歷史並非教科書上的定論，而是一場充滿未知的巨變。我的祖父在高中畢業後，選擇投身軍隊並隨軍來台，這個選擇與其說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不如說是在動盪中對生存安全的本能追求——在無依無靠的異鄉，國家武裝力量成了唯一的庇護。

在當時來台的軍人，其受教育程度整體偏低，如祖父這樣具備高中學歷者實屬少數。這群具備基礎知識的青年軍往往成為軍隊現代化的核心，所以祖父才能透過數學素養進入砲兵學校。這段經歷展現了在戰亂年代，知識如何被轉化成實

¹ 兩岸關係發展的歷程，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2025，
<https://www.mac.gov.tw/MAIRC/cp.aspx?n=BC8AC6C0E6AE79B8>

用的生存工具與晉升管道，使他在陌生的土地上獲得相對穩定的社會位置。

然而，生存的安穩無法填補鄉愁與隔閡，當祖父逐漸意識到家鄉已不可歸，他必須在台灣尋求情感與家族的延續。這段落地生根的過程折射出當時台灣社會複雜的族群位階。祖父曾與一名漢人女子互有好感，但是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漢人與外省人之間隱形的歧視和社會隔閡，²最終讓這段關係無疾而終。³

最後，祖父與祖母的婚姻則呈現了一種冷戰邊區⁴特有的結構性樣貌。這場在結婚前就從未謀面、全靠部下與其妻子幫忙傳話的婚約，充滿了時代的荒謬感：祖母原以為是同儕之間的玩笑，祖父卻視為承諾；曾祖父得知婚約的由來後雖憤怒至極甚至拔刀相向，卻因對軍隊武力的畏懼而屈從。⁵這不僅是一場充斥訊息誤差的誤會，更體現了軍人身份作為國家符號，如何強行介入原住民的家庭結構。

站在現代大學生的視角回望這段往事，我內心充滿了難以言喻的衝擊。對生長在自由戀愛年代、認為婚姻必須建立在深厚的相知、相戀、相守基礎之上的我來說，祖父母這種未曾謀面、甚至僅憑傳話與誤解便敲定的終生大事，實在難以想像。在我的價值觀裡，結婚是一場雙方人格與家庭經過反覆交流、確認後的慎重決定，然而在祖父母的故事中，婚姻更像是一場在生存邊緣的避風港。這種理解上的斷層讓我深刻感受到時代對個體命運的無情重塑。在那個年代，祖父需要的或許不只是愛情，而是在異鄉落地生根、對抗孤獨的生存策略，而祖母的家族的妥協背後則是弱勢族群在面對國家的武裝力量時，無聲的恐懼與自保。這種非典型的結合，是處於冷戰格局下兩個受創傷的靈魂，在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中為了活下去而拼湊出的「家」。這讓我體會到歷史不僅僅是課本上的文字，它更是介入了長輩們的生命選擇，迫使他們在婚姻大事中犧牲自由，換取了生存。

儘管祖父身在政治封鎖的台灣，他對江蘇(故鄉)的情感聯繫並未完全斷絕。在開放探親前，家族找到了一個特殊的溝通管道：透過日本親戚作為中轉，將信件包裝成與台灣無關的國際信件寄往大陸。⁶這種非正式的地下路徑可以看出在政治對抗之下，平民百姓如何利用舊有的全球網路來對抗國家的禁令。

² 228 事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2025，
<https://www.archives.gov.tw/tw/arctw/69-2263.html>

³ 受訪者邱寶琳(筆者父親)，訪談紀錄，2025 年 12 月 24 日，於受訪者家中。

⁴ 此處指台灣在冷戰格局下，作為地緣政治的前線，社會結構深受軍事化管理與族群隔離政策的影響。

⁵ 同前註 1

⁶ 同前註 1



圖一：祖父(右)回大陸江蘇探親與家人的合影。(圖片來源)⁷

三、從生番到國民的土地失落與抗爭

如果說祖父的故事是一場跨越海洋的空間流離，那麼祖母的故事則是本土權力被剝奪的認同震盪。我的曾祖父作為太魯閣族人，經歷了1914年的太魯閣戰爭，⁸以及長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在當時殖民政權的資源開發下，族人被納入工業化分工，負責伐木與採礦。我們家族原本居住在太魯閣砂卡礑溪的上游，在太魯閣戰爭結束約十年後，受到殖民政府推動的集團移住政策⁹的影響，開始從深山遷往平地。雖然歷史論述常認為這種政策瓦解了部落結構，但我父親在訪談中提出了一個充滿韌性的觀察：他認為日本雖然試圖拆散強大部落，但對原住民的內在影響其實有限。因為部落的組織體系雖然會變動，但文化與社會關係會重新黏合。即便被迫與不同部落的人混居，族人仍會依照原有的方式一起種田、工作，這證明了文化底蘊是比行政管理更強大的連結。¹⁰這種政策在1930年霧社事件後變得更加密切且強硬，但在那之前，日本多半還是以說服或鼓勵受教育的方式誘導族人遷下山。

然而在1930年代末，日本推行的皇民化政策¹¹，試圖將原住民變成日本國民的一員，但身份的轉變並未帶來實質的守護。當我的祖母從「生番」轉變為「國民」時，生活並未因此改善。隨著19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原本依靠土地自給

⁷ 由受訪者邱寶琳提供。

⁸ 帖喇·尤道，從太魯閣族對日本戰役看傳統價值面對殖民統治，原住民族文獻，第21期，2015，<https://ihc.cip.gov.tw/EJournal/EJournalCat/249>

⁹ 日本殖民政府為便於開發山林資源與管理原住民，將山區原住民部落強制遷至山下或指定區域生活的政策。

¹⁰ 同前註1

¹¹ 1937年至1945年間，日本殖民政府推行之同化政策。在原住民領域，透過身份轉換與改名等手段試圖徹底同化。

自足的族人，被迫捲入金錢經濟的巨輪。當生病、教育等現代生活需求都需要現金時，原有的家庭經濟體系崩潰了，土地成了換取生存的祭品。祖母那一代的年輕人為了賺錢湧入都市，原本耕種與狩獵的勞動方式逐漸改變，這種人口流動對部落的社會成員組織產生了劇烈的震盪。我父親指出，這背後的根本問題在於殖民擴張對土地主權的掠奪。¹²日本政府透過「理蕃政策」將原住民傳統領域視為「無主地」收歸國有，¹³雖然配予「保留地」並承認耕作權，卻始終不給予所有權狀。

這種產權制度¹⁴的缺失，反映了現代國家對原住民人格的否定。父親在訪談中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如果一個人20歲才登記戶口，難道他20歲之前就沒活著嗎？¹⁵原住民本就有自己的土地管理機制、邊界與交易規範，只是這套制度不需要文字登記，也不被國家「承認」。日本殖民者曾賦予原住民「非人」的法律地位，藉此宣稱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歸國家所有。即便到了現代，國家依然宣稱這些土地是它的，僅給予族人「使用權」。但在原住民的認知裡，這原本就是「我的土地」，這種所有權的概念是包含文化運作在內的，遠高於法律上的產權定義。

這種制度性的剝奪，在亞泥進入部落採礦時演變成了具體的騙局。當國家登記土地時，會先測量誰在使用，但卻將有礦產的山頭劃歸國有林班地。企業（亞泥）只要跟國家申請通過，便不需要顧及原住民，甚至利用資訊不對稱，製作「拋棄使用權」的文件。根據我父親的了解，企業當時對族人聲稱是「借地」並給予補償金，實則夾雜著威脅，讓不識現代法律文書的族人簽下拋棄書。這種威脅在官方記錄中是看不見的，企業與政府事後也絕不會承認。企業可以利用文字證明合法，使無法反駁的族人陷入無權的困境。¹⁶

這場騙局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當族人終於拿到部分土地的所有權狀時，才發現礦區那頭的權利早已消失，這才激發了長年的土地抗爭。這場抗爭的背後是「土地屬於祖先」的概念與現代產權制度的對撞。我父親參與的抗爭行動更多是致力於歷史真相的調查，試圖將口述歷史轉化為文字證據。他認為在證據力薄弱的現代法律系統中，族人不能只靠對抗，而是必須在思考上超越現代人。我們必須了解現代化的脈絡與制度規範，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重新解釋連結的方式。這種從街頭走向檯面上對話的過程，不僅是為了生存，更是為了讓那些在現代制度中被消音的權利重新被世界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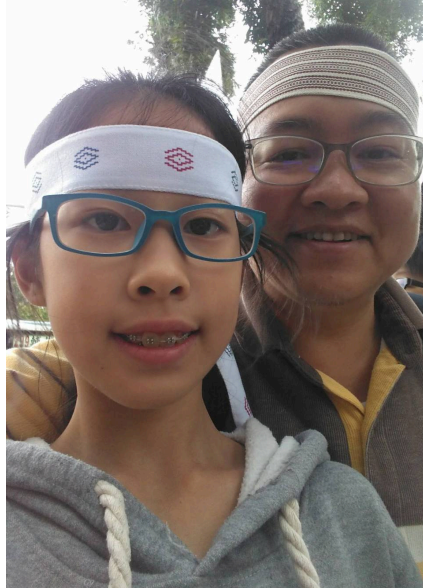
¹² 同前註 1

¹³ 雅柏魁詠·博伊哲努·陳怡萱，原住民族土地納入國家管理之過程，原住民族文獻，第三十九期，2019，頁 1-9，<https://ihc.cip.gov.tw/ihcfile/EJournals/39/39.pdf>

¹⁴ 此處指現代國家透過法律登記制度將土地所有權明確化、文字化，取代部落傳統的口述邊界與共有制度。

¹⁵ 同前註 1

¹⁶ 同前註 1



圖二：父親帶我參與抗議亞泥還我土地運動。(圖片來源)¹⁷

四、未來的責任：在歷史洪流中定位自我

在撰寫這份報告的過程中，我的內心始終交織著感謝與愧疚。身為擁有原住民身份將近二十年的大學生，我曾視這個身份帶來的資源為理所當然，卻未曾深究背後沉重的歷史成本。當我透過父親的口述，拼湊出祖父在戰亂中流離的身影，以及祖母和父親在體制剝奪下對土地的堅守，我感到一種遲來的後悔——遺憾自己未能在祖父在世時多和他交流。然而正是這份愧疚感，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家族書寫的迫切性：我不再只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這段未完敘事的承接者。

雖然我已經在都市生活多年，較少直接參與部落的文化實踐，但誠如我的父親所言，歷史的聯繫並非僅靠書本，更多是源於「身體的經驗」。我很感謝父親從小帶領我走進田間，那種與祖母一同在土地上勞動的觸感，讓原住民的文化不再是抽象的學術名詞，而是我曾實地經歷過的生活碎片。這種透過成長經驗建立的聯繫縮短了都市生活與部落歷史之間的落差，也讓我明白無論身在何處，土地的記憶早已刻在我的血脈中。

面對家族尚未結束的土地抗爭，我經常思考：在學習了現代化知識與新技術後，我能為部落做甚麼？父親在訪談中給了我極大的啟發，他認為現代技術(如管理、經濟、法律)並非現代人的專利，原住民同樣可以掌握這些工具。我現在在清華大學所學的知識不應該只是為了個人的職涯發展，更可以成為一種武器，去連結原住民的傳統知識與土地概念。我的責任在於，如何在現代產權制度與部落社會關係之間尋找一種新的連結方式，將過去被否定、被隱藏的權利透過現代的

¹⁷ 受訪者邱寶琳自攝

專業語言重新爭取回來。

最後，這份報告不僅僅是對家族往事的追尋，更是一場關於自我的定位。我是一個在冷戰格局與殖民遺緒中交會而生的後裔。在歷史的洪流中，我找到了「獨一無二的我」的立足點，我將帶著這份複雜的情緒與知識去承接家族的歷史，並在未來努力讓這份記憶繼續傳承下去。

五、參考資料

1. 訪談紀錄

受訪者:邱寶琳(受訪者為筆者父親，亦為故事中祖父母之次子)

訪談時間:2025年12月24日

訪談地點:受訪者家中

訪談背景:受訪者曾親自帶祖父回江蘇探親，並長期參與太魯閣族土地真相調查運動，其口述內容結合了親身經歷與觀察，以及聽取長輩講述家族往事，為本文的核心資料來源。



圖三:受訪者邱寶琳先生

2. 鴻義章。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補充教材-太魯閣事件。愛學網。

<https://stv.naer.edu.tw/data/supplementary/%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9%87%8D%E5%A4%A7%E6%AD%B7%E5%8F%B2%E4%BA%8B%E4%BB%B6%E8%A3%9C%E5%85%85%E6%95%99%E6%9D%90-%E5%A4%AA%E9%AD%AF%E9%96%A3%E4%BA%8B%E4%BB%B6.pdf>

3. 維基百科(2025年9月14日)。理番政策。2025年12月25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90%86%E8%95%83%E6%94%BF%E7%AD%96>
4. 葉高華。分而治之：日本時代原住民的集團移住。國立台灣圖書館。
<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75181618728.pdf>

AI 公具使用說明：本作品之敘事架構皆由筆者自行構思，核心口述內容皆為真實訪談所得。文中部分文字與語句，曾使用 AI 工具進行流暢度潤飾與學術用詞核實。